

四川大学「儒藏」学术丛书

儒藏论坛

(第二辑)

舒大刚 主编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四川大学「儒藏」学术丛书

舒大刚 主编

儒藏论坛

(第二辑)

◆ 本丛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每册定价48.00元，零售每册48.00元。本丛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每册定价48.00元，零售每册48.00元。

48.00元
0.001-5.000册
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
2003年12月第1版
421千字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四川出版集团

责任编辑:何 静
责任校对:付天星
封面设计:米茄设计工作室
责任印制:李 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儒藏论坛. 第2辑 / 舒大刚主编. —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07.12

(四川大学“儒藏”学术丛书)

ISBN 978-7-5614-3933-3

I. 儒… II. 舒… III. 儒学-文集 IV. B222.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4484 号

书名 儒藏论坛 (第二辑)

主 编	舒大刚
出 版	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 行	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 号	ISBN 978-7-5614-3933-3/B·179
印 刷	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	140 mm×202 mm
印 张	19.5
字 数	451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 001~2 000 册
定 价	48.00 元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
联系。电 话: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
◆网址: www.scupress.com.cn

學術委員（以姓氏筆畫爲序）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刁忠民（四川大學） | 王鈞林（山東師範大學） |
| 王新春（山東大學） | 申屠燼明（南京大學） |
| 田海平（東南大學） | 朱漢民（嶽麓書院） |
| 朱慶之（北京大學） | 李文澤（四川大學） |
| 李 申（上海師範大學） | 李宗桂（中山大學） |
| 李 剛（四川大學） | 李景林（北京師範大學） |
| 李耀仙（西華師範大學） | 呂文郁（吉林大學） |
| 呂紹綱（吉林大學） | 吳 光（浙江省社會科學院） |
| 吳洪澤（四川大學） | 吳榮曾（北京大學） |
| 何琳儀（安徽大學） | 林忠軍（山東大學） |
| 胡昭曦（四川大學） | 郭 沂（中國社會科學院） |
| 郭 齊（四川大學） | 陳廷湘（四川大學） |
| 陳恩林（吉林大學） | 陳鴻森（臺灣“中央研究院”） |
| 黃懷信（曲阜師範大學） | 黃玉順（四川大學） |
| 黃開國（杭州師範大學） | 曹順慶（四川大學） |
| 常金倉（遼寧師範大學） | 梁韋弦（福建師範大學） |
| 張文軒（蘭州大學） | 張希峰（北京語言大學） |
| 萬本根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） | 葛志毅（大連大學） |
| 單 純（中國政法大學） | 舒大剛（四川大學） |
| 鄒重華（香港中文大學） | 程啓立（山東師範大學） |
| 蒙 默（四川大學） | 楊世文（四川大學） |
| 楊朝明（曲阜師範大學） | 賈順先（四川大學） |
| 蔣宗許（西南科技大學） | 蔡方鹿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） |
| 廖名春（清華大學） | 鄭萬耕（北京師範大學） |
| 鄧立光（香港城市大學） | 劉 琳（四川大學） |
| 劉復生（四川大學） | 蕭漢明（武漢大學） |

謝幼田（美國斯坦福大學）

謝維揚（上海大學）

濮茅左（上海博物館）

鍾肇鵬（中國社會科學院）

龔鵬程（臺灣佛光大學）

編 委：王智勇 尹 波 李文澤 吳洪澤 郭 齊
舒大剛 楊世文

執行編輯：李冬梅

序

林慶彰

（臺灣“中央研究院”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）

2006年7月27日至8月3日，“中央研究院”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研究室同仁和臺灣其他大學研究經學同好，一行十餘人，赴四川執行“晚清經學研究計畫”，並參與四川大學古籍所與文哲所經學研究室合辦的“晚清蜀學座談會”。會上舒大剛所長除報告《儒藏》的進度外，還規劃出未來蜀學研究的宏大計畫。由於再大的研究計畫，都是從一點一滴累積而成，雙方都請有專精研究的學者報告晚清經學研究的狀況。

臺灣學者按各經順序，計提交論文九篇：

- (1) 晚清四川學者之易學研究（黃忠天）；
- (2) 《尚書》研究（蔣秋華）；
- (3) 《詩經》學述略（陳文采）；
- (4) 三禮學研究（程克雅）；
- (5) 《春秋》研究（丁亞傑）；
- (6) 《四書學述略》（鄭月梅）；
- (7) 《孝經》研究（黃智信）；
- (8) 晚清經學家通經致用的學術表現（車行健）；

(9) 廖平大一統學說的世界圖像之建構（魏怡昱）。

提交過程中有多篇論文，大陸老一輩學者提了相當多的建議。承舒所長好意，要在《儒藏論壇》中發表這些論文，為求慎重起見，我要求同仁將自己的論文作徹底修改，以免辜負舒先生的好意。為了說明這些論文的來歷，個人寫了這篇短文，權充一篇短序。

誌於南港“中央研究院”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研究室

代序——論晚清“蜀學”

舒大剛

(四川大學古籍所教授)

“蜀學”是一個古老的概念，其事起於西京，其詞則成於東漢^①。博攷載籍，“蜀學”一名蓋含三義，即學人、學校、學術。《漢書》所謂：文翁興學，“大化蜀地，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”^②；《三國志》載秦宓言：“蜀本無學士，文翁遣相如(?)東受《七經》，還教吏民，於是蜀學比於齊魯”^③；《華陽國志》亦謂“學徒麟萃，蜀學比於齊魯”^④。三處所指皆“蜀中學人”。宋呂陶《府學經史閣落成記》：“蜀學之盛，冠天下而垂無窮者，其具有三：一曰文翁之石室，二曰高公之禮殿，三曰石壁之九經。”^⑤《建炎雜記》列“蜀學”條目：“郡國之學，最盛於成都，

① 關於“蜀學”的含義，胡昭曦、劉復生、粟品孝等《宋代蜀學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0年版）第1~6頁有詳盡辨析，可以參攷。

② 班固：《漢書·循吏傳·文翁傳》，3625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。

③ 陳壽：《三國志·蜀志·秦宓傳》，四冊，793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。

④ 常璩：《華陽國志》卷三，214頁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4。

⑤ 呂陶：《經史閣落成記》，《成都文類》卷三〇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2頁，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6。

學官二人，皆朝廷遴選；弟子員至四百人，他學者亦數百人。”^①二處所指皆教育機構，即“蜀中學校”。李石《蘇文忠集御敘跋》：“臣竊聞之王安石以‘新說’行，學者尚同，如聖門一貫之說，僭也。先正文忠公蘇軾首闢其說，是為元祐學；人謂‘蜀學’云。時又有‘洛學’，本程頤；‘朔學’，本劉摯，皆曰元祐學，相羽翼以攻新說。”^②張之洞《尊經書院記》述辦院宗旨：“紹先哲，起蜀學。”^③此乃學術流派，即“蜀中學術”。唯斯三者乃為“蜀學”三大要素。無論是審視古代“蜀學”，抑或是評價近代“蜀學”，都應以此三要素為攷察目標。唯其如此，乃成為一完整之“蜀學”概念；也纔能準確全面地評估巴蜀地區學術之地位與價值。本文所要考察的“晚清蜀學”即兼此三者而言。

一、晚清“蜀學”的概況及其成就

本文所討論的“晚清”，係指道光後期（1840年鴉片戰爭後）至宣統三年（1911年辛亥革命）清帝退位為止。此70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之一，也是中西學術交鋒，新舊觀念激蕩，各種思想學術異常活躍的時期。在此期間，咸豐初年興起的太平天國運動，使原來人文薈萃之地的江浙地區“受禍最烈，文

① 李心傳：《建炎雜記》甲集卷一三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34頁。

② 李石：《方舟集》卷一三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8頁。

③ 張之洞：《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》，沔陽盧氏慎始齋刻本，西南大學圖書館藏。

獻蕩然”，致使“百學中落”^①。相反，偏處於內陸的四川地區，社會相對穩定，物產素稱富庶，為文化學術的發展準備了條件。近代“蜀學”正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環境下產生和形成的。“蜀學”的三大要素（即學校、學人、學術）在這一時期都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和壯大。

（一）晚清巴蜀書院，名列全國前茅

從學校而言，巴蜀地方政府辦學全國最早，淵源有自。漢景帝末年文翁“石室”，首開郡縣官學先河，教澤流衍，蔚然成風。及至清代，四川舉辦的各類學校仍居全國前列，僅就傳統書院和新式學堂論，其數量都居全國之首。

關於清代四川的書院數量，《中國書院制度研究》一書統計有383所，居全國第二^②。而胡昭曦先生《四川書院史》前後兩版的統計，一為504所，一為552所。依此數據，清代四川書院在全國的排名，肯定還會上升。胡先生還分析，四川552所書院中，明確可以認定是鴉片戰爭以後建立的有146所。另有143所建立日期不詳，但因其資料多見於咸豐以後地方志，“可以說這143所書院中的多數是鴉片戰爭以後建立的”。因此，晚清四川所建書院應是146所加143所，佔整個清代四川書院近一半左右^③。可見晚清是四川書院大發展時期。

①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192～194頁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3。

② 陳毅嘉等：《中國書院制度研究》，354～358頁，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7。

③ 胡昭曦：《四川書院史》，182～183頁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0。又修訂本（“四川大學‘儒藏’學術叢書”本），206～207頁，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6。

除舊式書院外，四川還是新式學堂設置最早的地區之一。中日甲午海戰後，光緒皇帝繼 1895 年批准天津成立北洋學堂（天津大學前身）後，於 1896 年批准成都成立四川中西學堂（四川大學前身）、上海成立南洋公學（上海交通大學前身）。在近代史上最早設置的幾所新式學堂中，四川中西學堂就是其中之一。1902 年中西學堂與錦江書院、尊經書院合併成立四川省城大學堂（或四川通省高等學堂），是四川最早的綜合性大學。

“戊戌變法”倡議“改書院，興學校”，光緒二十四年、二十七年分別頒布《改書院爲學校上諭》、《改書院爲學堂上諭》，二十八年、二十九年又頒布“壬寅學制”、“戊戌學制”，一時間，“所有書院，於省城改設大學堂，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，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”，四川各地書院紛紛改成初、中、高等新式學堂。

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“癸卯學制”頒布後，在四川省城組建了更多高等專門學堂，形成四川師範學堂（1905）和五大專門學堂：四川法政學堂（1906）、四川農業學堂（1906）、四川外國語學堂（1906）、四川工業學堂（1908）、四川存古學堂（1910），全面推行新式教育。它們和四川高等學堂一起，構成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。以上這些學校，後來逐漸歸入國立四川大學。民國初年調整各地高等學堂，四川成都仍然是“五大學區”之一，穩居中國西部之首。這些大學專業涵蓋了文、理、工、農、外語、師範七大領域，融會了傳統與新學諸要素，爲构建晚清“蜀學”提供了學術沃野和廣闊前景。

在晚清衆多書院和學堂之中，特別需要提到的是錦江書院、尊經書院和中西學堂。錦江書院於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在文翁

石室遺址上建立，主要學習制藝八股詩文，為科舉服務。尊經書院是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由洋務派首領、四川學政張之洞創辦，貫徹“通經學古”方針，不課制藝，專習儒典。中西學堂為培養“通達時務之才”，聘請英、法教習，“分課華文、西文、算學”，體現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徵。由是觀之，尊經書院、錦江書院和中西學堂分別代表了近代學校的三種類型：錦江書院重辭章，為科舉；尊經書院重經學，主致用；中西學堂重西學，講科學。分別代表科舉、改良和科學三種形态。

（二）晚清巴蜀學人，彪炳華夏史冊

晚清巴蜀士子人人向學，生員實繁其徒，張之洞《尊經書院記》有“全蜀學生三萬人”之說。在晚清四川學術和文化史上，許多著名人物多出自書院。胡昭曦先生認為：“遍布四川全省的書院，對四川近代社會的政治、文化乃至經濟、軍事，都有深遠影響，可以說，近代四川書院是變法維新的陣地、學術研究的基地、人才培養的搖籃。它在振興蜀學、發展蜀學方面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。”^① 這個判斷是非常準確的。

錦江書院前期培養的著名弟子有清代才子李調元，後期培養的弟子則有戊戌變法中殉難的“六君子”之一的劉光第、清代四川唯一的一位狀元駱成驤、史學家張森楷和思想家吳虞等。

尊經書院培養人才更為出色，它以豐富的辦學經驗，嚴謹的學風，精研的傳統，深厚的功底，奠定了晚清“蜀學”的基本風

^① 胡昭曦：《近代四川書院教育與蜀學人才培養》，見《四川書院史》附錄，370～371頁。

格和優良學風，培養了許多在四川乃至全國都有重大影響的人物，一時人文蔚起，蜀學勃興。研究四川近代史者曾總結說：“尊經書院從 1875 年建立到 1902 年改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的 29 年期間，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，對四川乃至全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，其中著名的有：為維新變法而英勇獻身的‘戊戌六君子’之一的楊銳；出任英法領事館參贊、力主新學的四川維新派核心人物宋育仁；博綜古今、離經叛道、學凡六變的經學大師廖平；才思敏捷、遐邇聞名的四川維新宣傳家吳之英；海內書法名家顧印愚；清代四川僅有的狀元駱成驤；領導群眾發動保路運動的蒲殿俊、羅綸、張瀾；為建立民國捨身殺敵的同盟會員彭家珍；功績卓著、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老革命家吳玉章；宣傳新文化、‘只手打倒孔家店’的吳虞。此外，岳森、劉子雄、胡從簡、劉洙源、杜翰藩、方鶴齋、黃芝、謝無量、林思進、傅增湘、劉咸榮、徐炯、夏之颺等一批四川知識界的名流都曾受業（或聚講——引者注）於尊經書院。”^①除上列名單外，還有尹昌衡、張森楷、顏楷、邵從恩等，也是尊經書院培養出來的著名人才。

至於由兩書院與中西學堂合併後組成的四川大學，湧現出的王光祈、郭沫若、周太玄、李劫人、朱德、蒙文通等人，更是文化精英，人間龍鳳！

（三）晚清巴蜀學術，蔚為國學重心

有“校”有“人”就有“學”。隨着晚清四川境內廣建學校，

^① 陳瀛涛主編：《四川近代史稿》，270～271 頁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0。

通博之士、致用之才應運而生，“蜀學”的成就也戛戛獨造，達到了歷史的新高點。

巴蜀地區，東限夔門，北阻劍閣，南賓夷越，西接藏羌，在地域上自成體系，在文化上也相對獨立，上古處於“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”的地位，因此學術風氣每每滯後外間。如西漢文景時期，中原已經華風浩蕩，百家爭鳴，成都仍然頗有“蠻夷之風”；東漢外間已經“古文經學”獨盛，蜀漢在三國時間還固守今文“章句”；魏晉南北朝，外間已經玄風大暢，文章綺靡，巴蜀仍然謹守兩漢文章、魏晉風骨；清代乾嘉而後，攷據之學大興，四川仍然謹守“八股”，不知有許鄭賈馬；等等，大有“不知兩漢，無論魏晉”之況。直至晚清一段時間猶然如是。錢基博說：“蜀處奧壤，風氣每後於東南，自中外互市，上海製造局譯刊西書，間有流布，蜀中老宿，蹈常習故，指其政治、輿地、兵械、格致之學為異端，厲禁綦嚴，不啻鳩酒漏脯。”^①這固然是一種落後，但是傳統尚存，若有特見獨立之士為之先導，往往能收“跨越式發展”之奇效，得傳統與新風結合之綜合效應。此所謂翫習者難為力，極弊者易為功也。如文翁之開石室，一掃蠻風，於是人才傑出，為天下典範；陳子昂獨標魏晉之風，一掃綺羅香澤之態，詩開盛唐之風。降至近代，張之洞為之倡，王闓運為之師，“蜀學”於是振起西南，雄視百代，為一時勝概。一方面，傳統未丟，而新風已入；另一方面，中學雖存，而西學已漸。於是乎傳統與新風共存，舊學與新學同醞；舊瓶新酒，集雜為醇，釀制出

① 錢基博：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，見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錢基博卷》，78頁，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6。

新舊結合、中西互補之美酒甘醴。

有如楊銳、劉光第、廖平、宋育仁、吳之英，皆自傳統經學而倡言“托古改制”、“復古改制”和“變法維新”；羅綸、蒲殿俊、吳虞、張瀾、吳玉章，皆自舊學而高標改良、革命。至於王光祈自經史而入於音樂，卒成一代宗師；李劫人自辭章而入小說，卒成一大作家；蒙文通自經學而入史學，終為經史名宿；周太玄自舊學而入於科學，獨獲“古今兼通”之稱；等等，更是巴蜀梗楠，華夏梓材。

即以傳統國學論，前乎此者，明清蜀人著作之進入《四庫全書》及其《總目》《存目》者，蓋寥寥焉，不經見也；而事隔不到200年，蜀人著作之進入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者，已突增至200餘種（據中研院《晚清四川地區經學家論著目錄》）。據統計，有清一代巴蜀學人經部文獻共約685部、作者285人，其中道、咸以後作者189人、著作514部；同、光以後又居其大半，有作者133人、著作409部！屬於“晚清”時段者竟佔70%左右，這無疑與晚清四川書院廣建、人才輩出、風氣大開有直接的關係。

不僅晚清蜀人著作數量大增，而且在質量上也是全國一流、首屈一指的。如廖季平之“平分今古”，論者將其代表作《今古學考》與顧炎武《音學五書》、閻若璩《古文尚書疏證》同譽為清學“三大發明”；俞樾亦稱《今古學考》為“不刊之書”；康有為則引廖平為“知己”；劉師培更是盛稱其“長於《春秋》，善說禮制”，“貫澈漢師經例，魏晉以來，未之有也”^①；章太炎也說：

① 蒙文通：《議蜀學》，《經史抉原》，102頁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5。

“余見井研廖平說經善分別今古文，實惠棟、戴震、凌曙、劉逢祿所不能上。”“廖平之學與余絕相反，然其分別今古確然不易！”

吳之英明於《公羊》，“尤邃《三禮》”，論者謂其“言《周禮》者最多最精。吾蜀宿儒廖季平先生外，吳氏實第一人”^①。宋育仁擅長文學，亦善經學，撰有《周禮十種》，其《周官圖譜》主張“復古改制”，宣傳維新變法，為改革號角，是皆一時之英而命世之才也。

二、晚清蜀學的地位與影響

關於定位問題，“蜀學”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影響和作用。其在兩漢，“蜀學”僅代表儒學在蜀地的傳播而已，其事件為“文翁興學”，其結果乃儒化巴蜀，“蠻風”丕變。其在宋代，“蜀學”乃形成學派，其人物為“三蘇”（蘇洵、蘇軾、蘇轍）、張栻、魏了翁，其結果是“蜀學”成為中國三大學術主流（理學、新學、蜀學）之一。第三次即在晚清，其特點是經學勃興，新學蔚起，觀點新穎，引領風騷；波詭雲譎，氣象萬千，是為“新蜀學”。晚清“新蜀學”是“蜀學”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，也帶來了清代學術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的新局面和新氣象。

首先，開創清代學術新階段。自尊經書院創辦，張之洞為之倡，王闓運為之師，促成了蜀學與江浙、湖湘之學的交流與融

^① 謝興堯：《周政三圖三卷提要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（稿本）》，第32冊，128頁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6。

合，得以蓬勃發展，大放異彩。其時蜀學的重要特徵是摒棄陳腐的“八股”時文，反對空疏繁瑣的學風、文風，注重對中國儒家經典的傳習和研究。同時，由於晚清動蕩多變的時局，“通經致用”、“中體西用”也得到提倡，成為晚清“蜀學”的突出特徵。

巴蜀學人發揚清學傳統——“以復古求解放”，從乾嘉學人所達到的最高點——東漢“許、鄭、賈、馬之學”，真正向前推進至西漢“今文學”時期，並進而回溯至先秦“諸子之學”時代，最終實現了對傳統一切學術的徹底解放^①。自鄭玄混合今古以來，千古學人不知經學有“今學”、“古學”之別、學術有“真孔”“假孔”之異。清代乾嘉考據之學，重實證，講考據，但多停留於名物訓詁即“許鄭”的基礎上；常州學派始講家法、辨別今古，但由於不知今古分歧所在，或以文字論，或以流傳地域別，或以傳授範圍分，都此牽彼掣，未得要領。廖平從治《春秋穀梁傳》而悟今古文學分歧在禮制，於是以今學主《王制》，古學主《周禮》，著為《今古學考》，“然後二家所以異同之故，燦若列眉”。千載迷案，一朝冰釋，將中國經學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。

蒙文通先生《議蜀學》論其事曰：

廖氏之學，其要在《禮經》，其精在《春秋》，不循昔賢之舊軌，其於顧氏，固各張其幟以相抗者也。世之儒者矜言許、鄭氏學，然徒守《說文》、《禮注》耳。廖

① 廖平本人即是“以復古求解放”的自學實踐者，其《與康長素書》曰：“歲星再周，學途四變。由西漢以返先秦，更由先秦以追鄒魯。”（廖宗澤《六譯先生年譜稿》卷三“民國二年”）